

胡適的大學教育觀

張耀宗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changstoic@gmail.com

摘要

本文主要探討胡適的中國大學教育觀，以其留學及在大學任教之經驗，進一步形塑胡適心目中理想大學之風貌。胡適有七年留學美國之經驗，接受現代化大學教育之洗禮，他的現代教育觀為何，也是本文所欲探究之處。胡適信仰個人主義，使其與現代性有了連接之處。他的點滴社會改良論，在於對問題所審慎之分析，並提出解決方法，對於教育改革有所啟發。進者，他認為大學在現代化進程上具有重要角色，大學應該致力於科學研究，以帶動中國的發展。胡適對於中國學術思想的現代化，具有重要影響力；但對中國大學教育的改革，相對地來得比較小。

關鍵詞：胡適、大學教育、中國教育

Hu Shi's Ideals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Yao-Chung Chang

Department of Early Childhood Caring and Education, Chung Hwa University of Medical Technology

Abstract

The object of this article is to explore Hu Shi's ideas of education and their effects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 especially university education, in China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Hu studied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seven years and accepted modern university education. Another object of this article is to inquire into Hu's ideas of modern education. Hu believed individualism and independent thinking was an initiating factor of modernity. Hu posited the concept of "step-by-step reform," whereby each problem would be coped with a corresponding resolution. Furthermore, he claimed that universities shoul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and they should become places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to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Hu's concept of "step-by-step reform" could inspire education reform. On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academic thought, Hu ha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while his influence is relatively small on the reform of Chinese university.

Keywords: Hu Shi, University Education, China Education



壹、前言

經歷兩次英法聯軍壓境，船堅砲利的打擊下，清帝國統治者意圖以「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謀求自強以抵抗殖民帝國之勢力。清廷在 1861 年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統籌對外事宜，成為推動洋務運動之主要機構。近人指出洋務運動教育改革的指導思想是張之洞等人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變器不變道」（毛禮銳、邵鶴亭、瞿菊農，1989：510）。這種向西方學習，並引進西方制度的過程，應算是一種「現代化」（modernization）的歷程。既然是現代化，張之洞等人之主張，即為肆應之道。西學西制壓境時，傳統的中學中制要如何自處，是進行現代化的中國必須面對之課題，傳統與現代對峙的動盪，是遂行現代化國家的共同問題，最顯明的例子便是約略同時間展開西化運動的日本。

既然要向西方學習，留學教育成為洋務運動的措施之一，起初派遣之留學生主要是學習西方技術，特別是軍事技術（毛禮銳、邵鶴亭、瞿菊農，1989：512）。留學教育一直持續到清末，胡適（1891-1962）為庚子賠款第二期官費生，1910 年到美國的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留學（唐德剛譯，2005：53-54）。在民風未開的時代，留學生算是引領風騷之人物，回國之後勢將留學學習所得引進祖國，成為「啟蒙」之重要人物。而胡適因提倡白話文運動，回國後成為北京大學教授，即為譽滿全中國之意見領袖，動見觀瞻，其言論對民初之中國發展起著相當之影響作用。胡適留學歸國於 1917 年 8 月任北京大學教授（約 1917 年 8 月至 1926 年），擔任北大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系主任（約 1931 年 1 月至 1937 年），最終任北大校長（約 1946 年 9 月至 1948 年）（胡適，2005：214-247）。胡適除了留學美國之經驗外，他與北京大學之關係相當密切，這也是他對於大學教育看法的基礎。

誠如陳平原（2010：160）指出，胡適把杜威的思維術和清代的考據學做了成功的「嫁接」，為日後大張旗鼓「整理國故」準備了有效的理論武器。¹陳氏此處所指係為胡適之研究方法，拿杜威的思維術來做為考據之方法，也就是其流傳後世之名言--「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一般而言，當向西方學習時，就如同胡適以杜威的思維術作為研究國故之工具般，中西雙方如何「嫁接」，如何順利過渡，一直是清末直至目前，華人社會所必須面對之課題。同樣地，胡適在研究方法上引進杜威的思維術，在教育上是否有類似的議論，是本文欲探究之處。其次，從洋務運動開始，引進西方教育，也就是教育西化，其實也是教育現代化，不管是學堂、還是學校，所引進的皆是現代化的學校制度。而胡適留學美國，顯然是接受現代化教育洗禮之人，他的現代教育觀為何？如何與傳統教育做一結合？也是本文欲探討之處。因此，本文題目為「胡適的大學教育觀」，主要探討胡適依據其留學經驗，對於中國大學教育及其發展面貌所提出之觀點。觀諸西方現代化之發展，近代大學為其背後推殆無疑義，因而在探討中國大學的興起，仍然需要借助近代中國現代化過程之理解。²

本文不足之處在於胡適並非專職之教育家，他的學術興趣廣泛，平生著述豐富，但與教育有關之論文，則是相當地少。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季蒙與謝冰選編之《胡適論教育》，將胡適平生之教育議論結集成冊，可作為本文論述之來源。

¹ 胡適（2005：203-204）認為他的白話詩試驗，一半是與朋友們多年討論的結果，一半是受實驗主義哲學的影響，實驗主義主張一切學理只是一種假設，必須要證實了（verified），才可算是真理。在此，胡適的白話文學論是一個假設，這個假設一部分已有歷史的證實，另一部分有待實地試驗的結果；而白話詩的實地試驗，不過是胡適的實驗主義的一種應用。姑且不論這種白話文學論與實驗主義之間的嫁接是否粗糙、唐突，然就證實（verified）角度來看，不知白話詩能夠「證實」什麼？解決了什麼樣的問題？余英時（2013：209-210）認為胡適在思想上一面提倡「科學方法」，另一方面則鼓吹民主自由，在當時都是「開風氣」的工作，用現代的名詞來說，也就是「啟蒙」的工作。這樣一個啟蒙式的人物，余英時（2013：210）認為既不能用中國傳統「經師」的標準來衡量，也不能用西方近代專業哲學家的水平去測度。

² 1694 年設立於日耳曼的哈列大學（University of Halle），被稱為「第一所現代化大學」（the first modern university），其因在於這所大學注重科學實驗，提倡學術自由（林玉體，1991：275）。大學重視自然科學研究係受到「唯實論」（realism）之影響，自然科學研究當然也推動西歐之現代化，加上科技發明，讓現代化成為勢不可擋之潮流，這當中大學對於現代化之啟動扮演極重要之角色。



貳、胡適與杜威的實驗主義

胡適在哥倫比亞大學修讀博士學位，其指導教授係為鼎鼎有名之杜威（John Dewey）。杜威身為實驗主義（或實用主義，Pragmatism）之大師，胡適在其門下當然深受影響，並將實驗主義嫁接至研究國故，也就前述將杜威之思維術做為其研究漢學之研究方法。在此，胡適對於杜威實驗主義之詮釋是否有誤，非本文之重點，而是胡適如何看待實驗主義，甚至將其視為畢生研究漢學之方法。

胡適（2006b：53）將杜威的哲學根本觀念，歸納為下列三點：一、經驗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對付人類周圍的環境；二、在這種應付環境的行為之中，思想的作用最為重要；三、真正的哲學必須變成解決「人的問題」。從杜威的哲學觀念，胡適（2006b：55）進一步衍伸杜威的思維術，也就是思想作用的五步說：

- 一、疑難的境地；
- 二、指定疑難之點究竟在什麼地方；
- 三、假定種種解決疑難的方法；
- 四、把每種假定所涵的結果，一一想出來，看那一個假定能夠解決這個困難；
- 五、證實這種解決使人信用，或證明這種解決的謬誤，使人不信用。

這五步說簡而言之為釐清問題，提出相對應之解決方法，也就是問題解決（problem-solving）的過程。胡適（2006b：107）認為研究問題的文章之所以有效果，正因所研究之問題一定是社會人生最切要的問題，最能使人注意與覺悟。胡適（2006b：60）進一步衍伸思想的真正訓練，是要使人有真切的經驗來做假設的來源，使人能造出方法來證明假設的是非真假。依據經驗作為假設的來源，加上問題是社會人生切要之問題，在於使問題成為真問題，而非空、虛與假的問題，真實的問題才值得提出方法來解決。

胡適（2006b：60）認為杜威這一派的哲學家論思想的作用，最注意「假設」，也就是五步說的第三步。為解決問題就得提出假設，並演繹相對應之解決方法，看看每一種解決方法的效果為何，「可以養成我們用效果來評判假設的能力，可以養成我們的實驗態度」（胡適，2006b：61）。胡適之名言--「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應該是出自對五步說之進一步歸納與濃縮。從分析問題、形成假設到以方法解決問題的實驗過程，來自所謂的「創造的智慧」（creative intelligence）。「思想是人類應付環境的唯一工具，是人類創造未來新天地的工具，所以當得起『創造的智慧』這個尊號」（胡適，2006b：52）。

「創造的智慧」隱含人類思想的主動性，這可從杜威的名言—從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來做註解，當人面對環境的問題時，可以製造工具以解決問題。胡適（2006b：185-187）嘗試比較從望遠鏡發現新天象（1609）到顯微鏡發現微菌（1675）間，中國與歐洲的學術發展，總結出中國除了宋應星的《天工開物》一書外，其餘均為紙上的學問，而歐洲則已走上自然科學研究的大路。只要是人遇著生活環境上的問題，都會嘗試著去解決，以致人類發展會有一通則存在，例如從茹毛飲血，到利用火來熟食。中國人也跟歐洲人一樣，也發明許多器具來解決生活周遭之問題；而差別則是中國人的學術思想，就如胡適所言只是紙上學問，不像西方運用所發明之器具，去尋找自然運作的原理原則，進而形成有系統之科學知識。

胡適（2006b：63-64）總結杜威的教育學說要旨有二：一、教育即是生活；二、教育即是繼續不斷的重新組織經驗，要使經驗的意義格外增加，要使個人主持指揮後來經驗的能力格外增加。胡適（2006b：64）進一步將這兩句話，合為一句話：教育即是繼續不斷的重新組織經驗。為著闡述這一段話，胡適以杜威常舉小孩抓火燙手之例來詮釋，小孩因燙手而知眼裡所見的某種知覺是和手的某種觸覺有關係的。總之，這只是尋出事物的關係，懂得種種關係，便能預先安排某種原因發生某種效果，這便是增加經驗意義（胡適，2006b：64）。當然，胡適（2006b：65）認為杜威的教育學說的哲學根據，是其實驗主義。

胡適（2006b：64-65）認為杜威的教育學說跟別人不同之處，就在於把「目的」和「進行」看做一件事。既然是經驗的不斷地重組，經驗的重組本就是在應付生活周遭所發生的問題，縱使有目的，也只是暫時性的目的，因為問題不斷地推陳出新。經驗的重組其實是在找方法，來解決所面對的問題。就胡適詮釋



下的杜威思想，雖可看出其普遍性，也就是其可一體適用於所有不同的生活情境，但這裡仍有些障礙仍需克服。

首先，中西雙方所面對的問題不同，所面對的生活脈絡與環境不同。例如，餓了想吃是人類生理需求的通則，但食物的來源則因地區環境的差異而不同，有的是稻米、有的則是小麥。³面對問題首先是要分析，不分族群的人們面對生活上的問題，都會預想各種解決的策略與方法；因此，杜威拿實驗的效果，或者使用方法的效果來比較孰優孰劣。中國人在面對的生活環境當然有很多的問題，也在生活中提出許多解決方法，因而能夠形成一種穩定自足的系統。而讓中國人感到危機的是殖民帝國入侵，在船堅炮利的威脅下，讓這個穩定的系統有了崩壞的可能。就事後諸葛的角度來看，胡適引進杜威的實驗主義、思維術是否能夠解決中國因殖民帝國入侵所形成的問題，這是需要打上很大的問號，然而在胡適所在的民國初年，是不會思考到此層次之問題，這是在西化行動展開多年之後的現在，所呈現的反思性想法。

如果考慮到問題所產生的脈絡，杜威的實驗主義、思維術和問題解決論等想法，最終是在應付美國，或者延伸至與美國文化同源的英國所產生的問題。然而，胡適並非沒有看到脈絡不同，橘逾淮可能為枳，全盤引進西方制度的結果，可能變成四不像的下場，甚至造成社會之解體。胡適在《每週評論》上，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引起當時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批評與攻擊。而胡適發表這一篇文章主要觀點是「著重外來進口的『主義』對〔解決〕中國〔實際〕實際問題，是沒有用處的」（唐德剛譯，2005：258），他進一步指出：

因而我更進一步指出，不顧實際問題而囫圇吞棗地把整套有偏見的外國主義搬來中國，實在是一種智慧上的懶惰。我強調，所有的思想都是從實際的困惑情況之下出發的——不管那是社會的、個體的、制度的或政治上的。這便是我對這一問題所做的實驗主義的處理（唐德剛譯，2005：258）。

胡適在此見到中國社會問題的解決，在於對於「實際的困惑情況」之分析與瞭解，解決的程序依舊是採「實驗主義的處理」，這也讓胡適採取的是點滴式社會改良觀。對於教育問題來說，中國傳統依附科舉制度所建立之教育制度，算是穩定之系統；但自鴉片戰爭之後，在西方殖民列強大軍壓境之下，這個教育制度已經無法讓中國面對西方列強的強取豪奪，必須要做大幅度之改革。但不管是採用全面式，抑或點滴式的改革，面對自身的問題好好地思考、瞭解與分析，提出相對應的解決策略，胡適對於問題處理的觀點基本上是比较合理穩當。

從胡適的點滴式社會改良觀，係以杜威之實驗主義作為依據，對於問題做完善之分析，以形成解決問題之方法與策略。胡適（2006a：5）一文曾提及孟祿（Paul Monroe）的主張，「一種新制學校非到辦理有成效時，不得代替同種的舊制學校」。所以，胡適（2006a：5）認為新制的學校應該從試驗學校辦起，等到試驗學校的成效已證明，然後設法推行這個新制。對於「一點一滴的改革」，胡適（2001a：218）曾對1952年1月6日《香港時報》中的一篇報導〈清除十萬積樞 留作幹部宿舍〉，在其日記留下：

……許多少年人正因為不耐『一點一滴的改革』，正因為他們夢想這樣『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的痛快，所以他們走上所謂『革命』的一條路上去，去追求所謂『根本解決』！須知十萬個死人棺材的根本解決，確是可以『大力』辦到的。幾萬萬個活人的生活與生活方式，是不能這樣蠻幹的。

對於無生命的棺材，將其遷建以建幹部宿舍，當然可採取革命之手段；但對於活人的生活，胡適則認為革命有待商榷，應謹慎為之。教育為百年樹人之事業，涉及到育人，是活生生且在發展中的人，教育改革更需要再三琢磨，清楚地瞭解問題之所在。

³ 胡適（2001b：48）曾提出「有限的可能說」（the principle of limited possibilities），此說在於生活只是生物對環境的適應，而人類的生理的構造根本大致相同，故在大同小異的問題之下，解決的方法，也不出那大同小異的幾種。例如因飢餓而產生吃的生理需求，不管是飯、麵包、麵條……，填腹充饑的食物不出動物與植物兩類，總不可能去吃石頭。



參、胡適與中國之大學

胡適在留學歸國之後，至 1937 年 12 月因國共內戰離開北京為止，期間大部分時間任職於北京大學，擔任教授、系主任與校長等職位。正因他與北京大學的淵源頗深，加上他留學美國之經驗，形成其對大學教育之觀點。胡適（2006a：3）認為民國元年的學制廢去各省的高等學堂，並規定「大學預科須附設於大學，不得獨立」，那是民國開國的一件大不幸的事。因各省設立大學的基礎被掃去，本省的高等人才就不能在本省做學術上的事業；大學太少，預科又須設在大學之下，因而各省中學畢業生必須走幾千里路，去投考那不可必得的機會（胡適，2006a：3）。胡適將大學視為學術研究之場所，好的大學對於國家社會的發展有莫大之助益，他常拿巴斯德（Louis Pasteur）對於微菌學（細菌學）研究，對於法國的產業與疾病治療有大貢獻為例子，來說明科學救國之道理（胡適，2006a：55-56）。同樣地，胡適（2006a：190-193）推崇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此大學雖創建歷史不長，但以研究院為主並致力科學研究，結果快速地成就美國學術領導地位。

清末的《欽定學堂章程》中，高等學堂設於各省省會，讓各省中學堂畢業生能夠進入就讀。中國各省能夠設立大學，除了讓學子減少奔波外地就學之苦外，胡適也認為好的大學能夠帶動各省的發展，各省的大學畢業生如能在當地發揮所長，必能帶動各省往富強之路前進。⁴在〈贈與今年的大學畢業生〉一文中，胡適（2006a：52）認為大學畢業生要防止墮落的第一個方子，即「總得時時尋一兩個值得研究的問題！」。有問題之後，便會試著買書、製造儀器來解決，而問題當然來自生活環境，而非空思幻想的假問題。如果民初中國各省皆能建立本省之大學，皆能如胡適所願致力於科學研究而解決民生問題，那中國的局面必然改觀，只可惜事與願違。

清末的教育改革中，廢書院、興學堂，而一些書院則改為高等學堂，如湖南的嶽麓書院改為湖南高等學堂，江寧鐘山書院改為江南高等學堂……等，但民國成立後，這些高等學堂停辦。胡適（2006a：28）對此不以為然：

二十年前的盲目的革新家不認得書院就是學堂，所以他們毀了書院來辦他們所謂「學堂」！他們不知道書院是中國一千年來逐漸演化出來的一種高等教育制度；他們忘了這一千年來造就人才，研究學問，代表時代思潮，提高文化的唯一機關全在書院裡。

在胡適的想法裡，中國的第一個大學是漢武帝時，由公孫弘為丞相，發起組織，招收學生所設立的太學（胡適，2006a：10）。這個太學算是國立大學的起源，同時在漢代也有私人的講學，其學生數有多有少，算是私立大學的起源（胡適，2006a：10）。在中國歷史上，私人講學常因政治問題而遭到壓迫，雖然環境艱難，但私人講學不輟，是學術傳播的重要基礎，歷代的書院與學派的盛行即為實例（胡適，2006a：10-

⁴ 在〈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一文中，胡適（2006a：263）提出當時（1947年）的中國應該有一個大學教育的十年計劃，在這十年內，集中國家最大的力量，培植五到十所成績最好的大學，致力於發展研究工作，成為第一流的學術中心，成為國家學術獨立的根據地。胡適這個提議並沒有獲得採納，國共內戰也讓此計畫沒有實行之可能；不過從現在臺灣現在的高等教育發展來看，胡適此想法確實有其先見之明，如果臺灣目前只有五間國立大學，其研究能量必然驚人且帶動產業發展，這五所大學要進入世界百大也輕而易舉。胡適 1957 年 11 月任臺灣中央研究院院長，1958 年 3 月 26 日的日記中，提到十一年前所發表的〈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一文，重讀之後覺得其主旨不錯，可惜沒有時間試行，當時也沒有人敢這樣做（胡適，2001a：523-524）。只是胡適斯時以其中研院院長之尊登高一呼，是可比這個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在臺灣施行，以中國之大當然不適合，但以臺灣之小當最適合此計畫；如果此計劃能夠實行，臺灣的高等教育發展將是一番不同的局面。胡適（2001a：524）對於「學術獨立」有其四個條件：一、現代學術的基本訓練，中國要有大學來充分承擔；二、國內應該有設備夠用與師資良好的地方，讓受了基本訓練的人才繼續專門的研究；三、國內應該有適宜的專門人才與研究機構來幫助社會國家解決問題；四、本國的學人與研究機關應該能和世界的學人和研究機構分工合作，共同擔負學術進展之責任。在此，胡適認為學術獨立有助於研究，中國需要解決的問題應由本土大學所培育的人才與研究機構來承擔。這種思維簡單地說，就是唯有中國人才瞭解自己的問題癥結在哪裡，中國的學術人才才能解決中國社會所面對的問題。胡適所言的「現代學術的基本訓練」，應是指西方的學術訓練，特別是研究、或者是科學研究上的訓練，這或許隱含胡適將這些學術訓練、科學研究，視為工具訓練，經由西方的研究工具，可以解決中國的問題。既然是「工具」即為價值中立（value-free），不用考慮脈絡適用的問題，可以順利地「移植」、「嫁接」至中國，與傳統知識做一結合。



11)。⁵

然而，在革命的年代裡，傳統有如敝屣，必除之而後快。胡適秉持的點滴式社會改革觀，不認為在引進西方知識的同時，必須把傳統知識（國故）放到廢紙簍，而是藉由西方知識體系的移植，而讓傳統知識能得到再生。同樣地，胡適持有大學是培育精英人才，以研究高深學術知識場所的看法；而傳統的中國書院扮演著同樣的角色與功能，當引進西方高等教育制度同時，如能讓書院轉化成大學或高等教育機構，將有助於中國之發展。

胡適（2006a：28）認為書院注重自修而不注重講授，提倡自動的研究而不注重被動的注射。就如同胡適（2006a：191）肯定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創建者—吉爾曼（D. C. Gillman），提倡新的大學見解、觀念、組織，帶動美國高等教育的革命。重視自動研究之書院，如能結合重視研究之西方大學制度，加以適度地轉化，而不是全盤摧毀，將更能帶動中國學術之發展。雖然，明清兩代有一些由官府補助以作為科舉預備學校的書院，但真正的書院精神在於以義理之學修養之道為教育中心，以學術為生命，不追求功名利祿（陳平原，2010：84）。章太炎對於中國的私學傳統極為推崇，令他不安的是由允許「群流競進，異說蜂起」的書院講會，轉為由「國家預設科條，以為裁制」，很可能會窒息學子的獨立思考和自我判斷能力（陳平原，2010：87-88）。章太炎同時意識到「教育現代化」過程中某種傳統人文精神的失落，乃至為之痛心疾首，不得不奮起疾呼「救學弊」（陳平原，2010：90）。

胡適與章太炎二者皆認為傳統書院有其可取之處，不能率爾廢除，知識之形成有其文化脈絡與特定語境，西方知識體系的形成也是如此。如果因中國積弱不振，必得經由西化以求自強之道，胡適也深知西方知識的在地化，不可能短時間即可造就，仍得需要長期的學習轉化。胡適對於千年相傳之科舉制度被廢除，也深覺可惜，就如同他視'Renaissance'（歐洲文藝復興）這個字句有復活、再生與更生之意（胡適，2002a：183），即可看出胡適想藉由西學來使傳統國故獲得再生與更生。中國本有悠久歷史之文化，面對從外國輸入的新文化，不自在的感受自然而生，真正的問題是「我們應怎樣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現代文化，使它能同我們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協調和繼續發展」（胡適，2006b：76）？胡適（2006b：76）對此的回答是：

這個大問題的解決，就我所能看到的，唯有依靠新中國知識界領導人物的遠見和歷史連續性的意識，依靠他們的機智和技巧，能夠成功地把現代文化的精華與中國自己的文化精華連結起來。

在胡適的想法裡，「歷史連續性的意識」應是改革的基礎，不能將傳統所建立的制度、典章一掃而空，這也是他感嘆於科舉制度與書院的廢除。胡適對於中國學術思想的貢獻有目共睹，跟傳統中國文人一般懷有「經世致用」之理想，除了學術研究，對於當時的政治社會提出針貶之見也不餘遺力。因此，胡適在教育方面的論述並不多，但在這些不多的論述中，可見到他對於大學教育的重視。只可惜民初中國軍閥割據，沒有一個強而有力之中央政府，再加上胡適並非當時教育之掌舵者，無法為中國建立一所像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這樣重視學術研究之現代化大學。

⁵ 胡適（2006a：11）認為中國的高等教育發展得很早，但是無法延續，沒有一間歷史悠久的學校：

因為人家的大學有獨立的財團，獨立的學風，有堅強的組織，有優良的圖書保管，再加上教授可以獨立自由繼續的研究，和堅強的校友會組織，所以就能歷代相傳，悠久勿替；而我們的國家多少年來都沒有一個學校能夠長期繼續，實在是很吃虧的。

如果胡適對於西方教育史，特別是大學發展史瞭解過深，應該不會有如此之議論。比中國太學出現的年代還早百年的雅典大學，它雖出現在紀元前三四世紀，正式關閉於紀元後529年（林玉体，1999：89）。胡適稱之悠久勿替之大學，應是中世紀三所母大學（mother universities）--義大利的沙列諾大學（University of Salerno）與波隆納大學（University of Bologna），法國的巴黎大學（University of Paris），與其所延伸之子大學（children universities），一直延續至現在。胡適所言之西方大學特徵確實如其所述，這些當然也是胡適留學美國所獲之經歷；然而，西方大學有如此之特徵，是在於中世紀大學的肇建初始，大學師生即享有某些特權，如學生訴訟應在大學裡進行，不必遠赴他地（林玉体，1999：90）。筆者認為中世紀大學跟羅馬教會有其關係存在，因而在面對大學所在地之統治者，因這層關係而能保有獨立法人之地位，這跟中國的太學與書院是有其不同之處。除去太學與官方設立或支助之書院，縱使是民間所立之書院，仍需朝廷之認可與支持，特別是明清兩朝，對於書院之箝制尤為強烈。胡適拿中國太學與書院去與西方之大學（university），是有點不太對稱，這兩者處在不同的脈絡下，因而有不同的發展理路。再者，縱使太學與書院繼續存在於中國，是否能夠成就胡適所心儀之西方大學之學風，仍需打上問號。



肆、胡適的現代性思維

就如前述，像胡適這些擁有留學經驗的中國人，往往會將西方思想與制度帶回中國，這些西方思想與制度帶進中國之後，往往被說成是促進中國的「現代化」(modernization)。現代化的內理係為現代性(modernity)，具有現代性思維才有可能帶動現代化的發展，而留學西方的中國人，在其接受現代西方之學術訓練之後，便將現代性思維帶回中國。在胡適身上，同樣可以見到現代性的蹤影，其帶動中國學術知識之現代化，更是毋庸置疑。在此，將探討胡適思想中的現代性，及中國應如何現代化，這樣的探討將可回應胡適心目中理想的大學是像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這樣的研究型大學，和大學在中國現代化歷程中扮演之角色。

胡適(2001a: 320)在其日記中，自承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其主要信條乃是一種健全的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不能接受各種社會主義信條」。或許，有人會將自由主義視為一種政理論，但個人主義卻是現代性的組成之一。麥克法蘭(Alan Macfarlane)認為現代性具有三個表徵：一、恰到好處的人口結構；二、政治支柱；三、一種特定的社會結構(曾可穉譯，2014: 21)。其中，第三個表徵是代表家庭力量必須被削弱，基於血統的社會分層(stratification)必須被消除，一個開放的、流動的，相對強調個人功績(relatively meritocratic)的體系必須被建立，公民效忠的對象為國家，這有賴個人取代集體，成為社會的基本單位(曾可穉譯，2014: 21)。在此，可看出個人主義為自由主義和現代性的共同組成要素，也可見到國家在推動現代化的重要性。個人靠著成就功績而往上流動，國家越過家族、血親，帶動健全的個人而促進現代化。

胡適(2006a: 168-169)認為杜威的教育哲學，全在他的《平民主義與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一書裡。平民政治的兩大條件是：一、一個社會的利益須由這個社會的分子共同享受；二、個人與個人，團體與團體之間，需有圓滿的、自由的交互影響(胡適，2006a: 169)。

根據這兩大條件，杜威主張平民主義的教育須有兩大條件：甲、須養成智能的個性(Intellectual individuality)，乙、須養成共同活動的觀念和習慣(Co-operation in Activity)(胡適，2006a: 169)。

胡適(2006a: 169)把「智能的個性」詮釋為獨立思想，獨立觀察、獨立判斷的能力。平民主義教育的第一個條件，就是要少年人能運用自己的思想力，把經驗得來的意思與觀念，一一加以實地驗證，對於一切制度習俗都能存在一個疑問的態度。至於，「共同活動的觀念和習慣」係使人人都有一種通力合作的天性，對於社會生活有濃摯的興趣。

從上述中，可見胡適的個人主義觀全然受到杜威之影響，而杜威的個人主義觀是西方個人主義的一種詮釋，而不管其詮釋為何，個人主義即在追求健全之個人，而這健全之個人成為推動西方現代化之主要力量。就如胡適(2006a: 196)所言：人類的一切發明，都是由個人一點一點改良而成功的。惟有個人可以改良社會，社會的進化全靠個人。所以是個人來推動社會的改革，胡適希望個人能超越傳統中國家族觀之影響，擺脫個人需依附在家族之下的侷限，以造就中國社會的改變。

眾所周知胡適對於科學的提倡不遺餘力，對於傳統中國的學術與知識發展，沒有往科學發展感到惋惜。荷蘭人發明望遠鏡，伽利略加以改進以觀天象，李文厚利用發現微生物，而同時期的中國士人仍只在故紙堆中從事考證之學(胡適，2006b: 185-187)。對於中國不往科學的道路上走，而在學術知識發展上跟西方相比較處在劣勢，胡適是深以為憾。因此，他回到中國之後，積極地推動科學的普及。胡適(2002b: 63)曾在《獨立評論》第七十七號發表〈建國問題引論〉，對於中國的現代化提出下列看法：

我前幾年曾說過，我們只有一條路，就是認清了我們的問題，集合全國的人才智力，充分採用世界的科學知識與方法，一步一步地作自覺的改革，在那自覺的指導之下，一點一滴的收不斷改革之全部。



現代化的過程其實是理性化的過程，如同韋伯（Max Weber）所言之除魅（disenchantment）過程，如此的過程降低神秘、迷信對於人們的影響，這也是當時胡適所處社會最需要的過程，如此才能帶動中國社會的現代化發展。神秘與迷信有時也是傳統的一部分，特別是未受西方科學影響的中國，此時「自覺的改革」需要的是觀念的改變，需要一點一滴的銖積寸累，不可能一下子即能風行草偃。

胡適受其業師杜威之影響，經驗不斷地改造與重組，在生活上就是不斷地解決問題，這種問題就要技術不斷地改良。杜威重視技術教育，胡適當然也受其影響，技術的發明與改良如望遠鏡、顯微鏡，除了可克服生活的問題外，也可帶動科學的發展。無可否認地，工業革命帶動英國的現代化，而這背後來自於英國在農業時代，大量地利用風車與水車來替代人力，使用動物力、水力與風力的結果，是讓農業越來越「機械化」（曾可穠譯，2014：39-41）。麥克法蘭認為英國人因喜歡利用機械力來替代人力，造成「當時英格蘭已經開發了高水平的工藝技術和可信知識，能夠游刃有餘地駕馭物質，尤其善於通過機器（齒輪、槓桿等），將「自然」能源轉化為人類可用的東西（曾可穠譯，2014：46）。同時期的中國對於技術創新與改良的態度，顯然不像英格蘭人，或許如同麥克法蘭引用速水融的「勤業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概念，認為中國人和日本人利用增加勞動力的手段，來提高農業的產量，因而不需要靠機械力（曾可穠譯，2014：38）。

胡適（2006a：254）在一篇〈論中西文化〉的殘稿中，表示：

一紙飛機，一副電話機，一輛汽車，雖是物質的，卻都表示人類最高的心思智慧，都是人類用聰明才智去征服環境的作品，所以都是刮刮叫的精神文明。

他進一步表示「物質器械的進步不但代表人的聰明才智，還代表一種純粹精神的態度：不知足的態度。『不知足』就是不從現狀為滿足，總要設法改良，總想在進一步」（胡適，2006a：255）。胡適對於技術改良的推崇，同時也點出中國人不樂意從事技術改良，不熱衷發明新器械以改善生活的不便。當面對西方殖民強權船堅炮利之進逼，滿清政府只是單純地想「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而忽略技術背後是需要心思智慧做後盾。

對於像胡適這樣具有清末民初之間動盪經驗的留學生，堅定地的救國心與愛國心是無庸置疑，但要用什麼來力挽頹敗中國於狂瀾，則是值得深究之處。胡適（2013：193）對於日本為何能夠成功地現代化，有以下的看法：

……于一九三三年，我曾想法解答這個疑難之點。當時我提供的解釋：中日文化界對於現代化的反應截然不同。我描寫日本的現代化是在一個中央集權的控制下實施的，特別是由於一個統治日本封建的軍國主義階級所促成的。從這個階級產生幾個維新的領袖。他們不但決定要改變什麼，決定不改變什麼，而且還擁有實現該等決定的政治權力。……

當然，日本現代化的成功不是只有中央集權一種因素，但對比中國蹣跚的現代化之路，中央集權卻也成為現代化成功的必要條件之一。民初的中國正是軍閥割據的年代，連年的戰禍國家未能統一，使得中國的現代化變得遙不可及。胡適這種中央集權、由上而下的現代化改革看法，其實可反映出「自覺」並非一蹴可及，觀念的改變並非彈指可見。這同時可顯現大學在現代化進程的重要性，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比較能夠接受外來新觀念與新事物，就如同胡適這些喝過洋墨水的留學生。如前所述，胡適一直期待中國能出現像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這樣的大學，強調要有充足的經費供應大學從事學術研究，這可看出胡適期待大學在中國現代化之路上，扮演重要的推動角色。但事與願違的是胡適本身並不喜歡當官，長期在大學與學術機構任職，在建立中國現代化學術體系有相當之貢獻；相對地，由於不是教育當局之掌權者，沒有機會具體實現其大學教育之想法。

伍、結語



相對於胡適的學術成就，在教育上，胡適之影響力相當渺小，這與其不喜為官，以致沒有實質權力以發揮教育改革之理想。然而，在這渺小之中，卻可見到胡適推動中國教育往現代化發展之斑斑駁駁，期待教育能夠帶動人才提升，讓這個沉睡的封建巨龍能夠騰起飛揚。在大學教育上，胡適則強調大學的科學研究之使命，相當肯定大學對於社會發展所發揮之影響力。大學除了傳授高深知識之外，同時致力於科學研究，當然能夠擔起引領社會進步之領頭羊角色。在胡適的教育思想上，大學教育應是占最大之篇幅。

胡適秉持其點滴式社會改良論，而非全盤革命論，改革需要傳統作為基礎，而非一刀切。一切改革須以問題的釐清為前提，應先確認此問題為真問題，而非空、虛與假問題，並據此提出相對應之解決方法。「多談問題、少談主義」，在於人類社會的問題，需要謹慎為之的點滴式解決，透過全面的主義式革命，往往帶來浩劫，這在人類歷史中屢見不鮮。總之，胡適的點滴式社會改良論，放在現時的教育改革上仍具意義。

胡適具有留學美國之經驗，接受西方現代化大學教育之洗禮，在其思想中含有不少現代性思維。他是個人主義的信仰者，相信個人是社會改良的推動者。他更重視科學研究與技術發明，認為這是推動中國進步的力量，而這些全是現代化的基礎。斯人已遠，胡適這一代的知識分子，具有堅定的救國與愛國心，把中國興亡長存心中，對於任何有助中國進步的事業，無不熱切地提出針砭之見，只可惜當時的情境讓好意見與好想法無法遂行，讓中國的現代化虛擲在政治權力的爭奪中，這是後人需引以為鑑之處。

參考文獻

- 毛禮銳、邵鶴亭、瞿菊農 (1989)。中國教育史。臺北市：五南。
- 余英時 (2013)。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上海市：上海三聯書店。
- 林玉體 (1991)。西洋教育史。臺北市：文景。
- 林玉體 (1999)。西洋教育史。臺北市：師大書苑。
- 胡適 (2001a)。胡適日記全編—1950-1962。合肥市：安徽教育出版社。
- 胡適 (2001b)。讀梁漱溟先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載於胡適等(合著)，胡適與中西文化(頁 35-52)。臺北市：水牛。
- 胡適 (2002a)。中國文藝復興運動。載於李敖(編)，胡適選集(一)演說·序言(頁 181-199)臺北縣：李敖出版社。
- 胡適 (2002b)。建國問題引論。載於李敖(編)，胡適選集(二)人物·雜文(頁 55-63)臺北縣：李敖出版社。
- 胡適 (2005)。四十自述。臺北市：遠流。
- 胡適 (2006a)。胡適論教育。合肥市：安徽教育出版社。
- 胡適 (2006b)。胡適論治學。合肥市：安徽教育出版社。
- 唐德剛(譯註)(2005)。胡適口述自傳。臺北市：遠流。
- 陳平原 (2010)。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心。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
- 曾可穠(譯)(2014)。現代世界的誕生(原作者：Alan Macfarlane)。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原出版年：2001)

